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主编

佛教的中国化

许抗生 著



佛教的中国化

许抗生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的中国化/许抗生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8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主编)
ISBN 978-7-80254-005-7
I. 佛… II. 许… III. 佛教-研究-中国-文集 IV.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054473 号

佛教的中国化

许抗生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1(编辑部)

策划组稿: 黄夏年

责任编辑: 张伟达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45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80254-005-7

定 价: 32.00 元

天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主编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



佛教的中国化

许抗生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到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





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

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总
序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



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





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自序

我学习和研究中国佛学,是我大学毕业之后,于1963下半年考上汤用彤先生招生的中国佛学史专业研究生开始的。当时汤老已在病中,他一直坚持着在病榻上指导我的学习,为我讲解佛教典籍,我就在汤老的指导下,开始了我对中国佛学的学习。不幸的是,我的学习刚刚起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汤老就离开了我们,与我们永别了,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不可挽回的损失。汤老去世后,任继愈先生又接着指导我一段时间的学习。汤一介先生也十分关心我的成长,也帮助我学习过《弘明集》、《出三藏记集》等。但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即已爆发,我的学习随即中止了十余年,直至1978年才开始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研究。

汤老原先是要我攻读隋唐佛学史的。但要研究隋唐佛教,又必须首先要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有个清楚的认识和把握,而两晋时期是我国佛教的“始盛”时期,或者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时期,其





时高僧辈出,佛教学派林立,所以我一开始就把佛教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两晋佛教上。我的第一篇佛学论文,就是《略论两晋时期的佛教哲学思想》,发表在1981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第六期上。我的佛教专著《僧肇评传》一书,也是研讨这一时代的佛教思想。然而两晋佛学又与魏晋玄学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而魏晋玄学又是对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发展。就这样,我又研究了魏晋玄学与先秦的道家思想,撰写了有关魏晋玄学、先秦道家的一些著作与论文。这样一来,反而远离了隋唐佛学的研究。之后,再回过头来研究隋唐佛学,但年事已高,再没有以往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这项研究工作,虽说也写出了一些有关隋唐佛教的论文,但都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没有能够完成汤老交给我研究隋唐佛教的任务,这是我一生中一大憾事。

我的佛学研究一向比较重视对佛教中国化问题的研讨。佛教中国化是我们研究中国佛教的一大课题。它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意义。中国佛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中外文化交融在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范例,中国佛教既有着与印度佛教相同的一些共同的特点,又有着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思想的特色。中国佛教最大的特点是她的包容性。她是圆融了中印文化,

实现了佛教中国化而产生的。她已成为以儒、佛、道三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此我们今天来总结和研究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及其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当现如何来吸取外来文化应该说是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的。正是有鉴于此,我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较重视佛教中国化问题的探讨,曾撰写了三十余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现从中选出了 22 篇编成一部论文集出版。我想,此论文集的出版,总算是我对恩师汤老及任继愈先生、汤一介先生等栽培的一个回报。由于自己的思想水平有限,论文中有错误与不足之处,恳请时贤们批评指正。



许抗生

2008 年 2 月

自
序

目 录

总 序	朗 宇 (1)
自 序	许抗生 (1)
简论佛教的中国化	(1)
汉代佛教与黄老方术思想的结合	(18)
略论三国时代的佛教思想	(25)
略论两晋时期的佛教哲学思想	(33)
魏晋玄学与佛教	(72)
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研究	(116)
南朝佛教论中印文化之同异	(129)
——析宋齐之际佛道两教的夷夏之辩	
论隋唐佛教的特点	(136)
——读《汤用彤全集》第二卷	
略谈三论宗的佛教思想	(149)





简论天台宗和华严宗的佛教思想	(158)
略论禅宗佛学的理论基础——真如缘起论	(191)
《坛经》禅宗思想来源初探	(201)
禅宗与老庄思想	(218)
从唐代士人的信佛看佛教的社会作用	(228)
延寿《万善同归集》诸宗融通思想	(234)
略谈中国佛教的伦理学说	(244)
简说儒佛道三教在形神观上的融合与纷争	(283)
读汤用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学术论著	(302)
冯友兰先生论中国佛学的特点和发展阶段	(321)
智颢佛学思想研究的可喜成果	(334)
人间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339)
中国佛教伦理思想与当代社会道德文明 之建设	(347)
后 记	(358)



简论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问题,是中国佛教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研究不多,在此仅能简略地谈几点自己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佛教中国化过程, 是印度佛学逐步成为具有 中国特色的佛学,即中国佛学的过程

中国佛学具有两重特性:(一)具有与印度佛学的共同性(坚持佛教的基本教义,如主张苦、空二谛,追求涅槃寂静等出世主义思想)。(二)具有与印度佛学不同的中国特性(个性)。所谓中国特性,即指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固有的思维方式(模式)的特点。因此中国佛学,它既有一般佛学的特点,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这两种文化有机的结合(或融合)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中国佛学具有融合性。中国佛学要融合我国古代儒、道两家的思想。儒家文化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文



化;道家(包括道教)文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补充。因此佛教的中国化,就不可能离开儒(封建伦理思想,如忠、孝、仁爱等)道(贵无思想等宇宙论学说)两家的思想。中国佛学还要能融合印度各派的佛学思想。印度佛学各种流派与各种不同的佛教经典思想,基本上是一起介绍到中国来的,而各种流派与各种经典的思想,则是迥异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对立的。面对这一情况,中国僧人怎样来接受印度的佛教思想呢?其办法是从佛学的理论学说上,采取融合吸收印度佛教各派和各种不同经典的思想,因此建立起中国自己的佛学理论体系;从佛教经典的组织形式上,提出了判教的学说,即把各种不同的佛典按照自己编定的顺序,当作一个前后有序的整体组织起来,并把自己所崇奉的经典当作最后最高的经典,因此来抬高自己宗派的地位。

二、佛教中国化过程

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一)汉魏佛教初传时期

佛教最初传入中土,当推西汉末年。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中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浮屠”即是“佛陀”的最早译语。《浮屠经》即是《佛经》。可见,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佛教即已传入